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九七期 ——
(二〇〇九年四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04b)

【史海钩沉】	文革告密个案研究：以吴大昌为例	冉云飞
【研究报告】	非理性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和他的情欲、妄想和潜意识（下）	宋永毅
【往事追忆】	隔离审查进“牛棚”	戴维堤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文革告密个案研究：以吴大昌为例

• 冉云飞 •

文革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惨绝人寰的时期，从中央集权的上层到贩夫走卒的民间，无不受到极大的冲击。红卫兵明火执仗的、带有抢劫性质的抄家、准军事性质的疯狂武斗、大规模无序的串联、各种内部杂志及小报的互相谩骂与诋毁、诸种派系缠绕不清以及瓜分豆剖的利益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看，基本上是不按以前的牌理出牌。人们都拿毛泽东作为自己谋取个人私利——私利肯定不单是指钱，还包括地位、话语权以及政治正确等——的挡箭牌，作为自己整治敌手及其他派系的道德安全帽。许多人戴着这项安全帽横冲直撞，干出不少令人发指的事，使许多人的生活走形，权利被剥夺，家庭解体，以至自杀及他杀无数。

对文革得出上面的总体结论，其实并不难，因为这已经是实事求是的、有良知的文革研究者的基本判断。但怎样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个人所遵循的研究路径是不一样的。我愿意从个案研究出发，从第一手原材料、公私个人档案来对我感兴趣的文革历史，进行研究。文革可研究的领域，浩瀚庞大，一个人要做出较为全面的相关研究，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我对文革感兴趣的领域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材尤其是语文教材，另一方面就是与我正在撰写的《中国告密史》相关的文革中的告密。如同我的右派研究一样，我对资料整理和梳爬的兴趣，更甚

于得出某种自以为正确的结论，我承认这是受胡适先生治学风气影响所致。

胡适先生曾于1953年台湾省文献委员的一次欢迎会上以《搜集史料重于修史》为题做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以彼时尚不能完全自由言说的台湾二二八事变为例：“二二八事变是一个很不愉快的事，现在距离的时间很短，在台湾是一件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不能不讨论这个问题，但讨论时不免有许多主观的见解，而关于这件事，就有许多材料不能用，不敢用，或者不使用。在这样的情形下，与其写一部志书，在方志中简单地将二二八事件叙述几遍，远不如不去谈它，不去写书，而注重在保藏史料这一方面，使真实的材料不致毁灭，而可以发表的就把它发表。这是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原料比制品重要，说明过早提出结论，不如多保留各方面的材料，到可以发表的时候当作原料发表，不加以论断。不要使原料毁灭，我以为这个工作比编志更重要。”在国内搞文革研究，还有许多禁区，胡适先生这个极端的例子，可以拿来我们在国内作文革研究的人借鉴。强调对胡适先生这一说法的借鉴，并不是要你抱着资料老死，而不作任何整理和研究。事实上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的确很重要。有过史学研究经验的人，都知道要研究一个问题、一个人物及相关时代，最好是能快速查阅与此相关的目录。但文革的资料，过于浩瀚，加之官方基本禁止研究，任何个人的收集能力都有限，所以据我了解，在国内是没有比较完备的文革资料编目的，更没有这方面像样的目录资料汇编。很多文革研究者并没感到资料编目的重要性，其实这是一个绝大的失策。我自己所收文革资料，虽然不多，但也是作了基本编目的，以便将来自己研究方便，从中也可以总结出一些相关的观点。如果我们能集多人之力，合力编一本关于文革史料的目录汇总，一点一点的增加，将是对文革研究的绝大贡献。我希望我这个在胡适先生“搜集史料重于修史”的说法影响下的提议，能够得到同好研究者们的响应。

现在我以自己拥有的第一手原始材料，来对文革中的告密作一点小小的解剖。这样的研究文章，以后我会陆续写出来，到一定数量的时候，我会对文革中的告密，做出自己的总结。这个总结便是我一直想写的一本书——《文革中的告密运动》。

一、告发者及所涉人物之关系

这是一叠我2004年10月底，从一上海网友处拍得的文革资料，所有材料，十六开，共五十八页，钢笔写就，多为告密、交心、汇报材料，作者名吴大昌。从内容上看，复以查一系列的出版史料，得知吴大昌之父母吴拯寰、秦世华曾在民国时经营私营的上海三民图书公司。下面系作者与所涉人物关系的一个简要介绍。

父亲吴拯寰（1896—1984），上海嘉定人，出版家。曾于大、中小学执教，1925年创办上海三民图书公司，任总经理兼总编辑，编辑出版有《孙中山全集》《孙中山续集》《孙中山评论集》《孙逸仙传记》（译文）《廖仲恺全集》，以及教育、医学、音乐、体育等方面著作120多种。四九年后出版有《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郑成功》《红楼梦》《太平天国》等连环画。著有《拯庐校勘记》《模范游记读本》等。1946年，吴拯寰将其在嘉定城西练祁河畔住宅一幢创办私立高义小学，常年支付学校全部开支，学生免收学费。晚上加设补习班，供附近农村居民补习文化，后该校由共产党接办。1949年后，任上海通联书店出版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暨上海童联书店董事长，1956年受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母亲秦世华，亦为上海三民图书公司的合作者。

哥哥吴大业，曾工作于家人办的大众法学出版社，于三民图书公司支薪。曾参与绘制出版一系列连环画，如《红楼梦》等，毕业于东吴法学院。事发时供职于上海文化出版社。

陈丽琳，系吴大业之妻，告发者的大嫂。

吴继明，系其二姐。

刘印石，系其二姐夫。

吴继麟，系其三姐。

马希龙，系其三姐夫，材料里言其为反革命分子。

陈肆言，系其姨父。

周庆镛，系其姨母。

秦仁瑞，系其姨母。

秦瘦鸥（1908—1993）：小说家、记者、编辑、翻译家。上海嘉定人，原名秦浩，系秦世华远房亲戚，四九年前即著名于海上，与田汉、夏衍、王统照、孔另境、胡考、司马文森、周瘦鹃、唐人、丁悚、黄佐临等交情匪浅。著有小说《秋海棠》《劫收日记》等，译有《华雷斯侦探小说选》等。

潘凤宝，系其家保姆。

吴大昌（1933—）：本告密材料执笔者。曾与其兄吴大业于三民图书公司开办的下属出版社——大众法学出版社工作，任会计。事发时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工作。

二、告发父母

据这一叠检举告密资料显示，吴大昌检举揭发的是其直系亲属和远房亲戚，包括自己家的保姆，以及自我交心。这其中的告密内容尤以告其父母和哥哥吴大业为多，我的分析以此为主体，兼及其他被吴大昌所告发的人。

中国告密有着悠久的历史，因素甚多，但与漫长的专制制度息息相关。专制制度因为要剥夺他人的权益，侵犯他人的人权，又要防止这些受侵害者起来反抗，于是就采取告密来作为专制制度确保其稳定运行的基本策略。但四九年前，亲亲相隐亦即容隐制度作为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各朝代的法律制度容有区别，但此一制度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在实际生活中为历朝历代所沿用。亲亲相隐制度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对“父攘羊，子证之”的案例做出了否定的回答，“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正如后世的《盐铁论》所说：“闻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相坐也。”而《云梦秦简》所载秦律更是规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所谓非公室告是指家主擅自杀死、刑伤、髡剃其子或奴婢以及儿子杀伤父亲的奴婢或盗窃父亲的畜产，如果告者所发为此，则不予受理，若继续告，再定告发有者罪。秦律可谓严苛——当然这里面涉及到在今天看来随便杀虐的违法行为——但也有一点子女父母可互免作证的意思。一贯以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的商鞅虽然鼓励告奸，但也绝不鼓励告发父母。

但一九四九共产党得鼎后，一切都来了个大摧毁，容忍制度也被视作封建垃圾扫除已尽。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批二胡（胡风、胡适）、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反右斗争、大跃进、大炼钢铁、三年大饥荒、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共产党无不采用告密制度以行使其残酷的非人统治，最后到文革时登峰造极。因之兄弟阋墙、夫妻反目、父子告讦之风层出不穷，而极权政府也乐意通过如此手段来稳固其残酷的统治。因为这样的统治成本很低，收效却甚大，这收效便是人人自危。至亲之人之间再也不可能吐露真心话，这是一种怎样的人间地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亲人之间的告讦不再是件可耻而被禁止的事，而是被当权者所提倡。最主要的提倡方式就是，与所谓的罪恶的父母和亲人划清界限，与剥削家庭划清界限，而划清界限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呢？就是告密，将父母和亲人之间所谓的罪行揭发出来，从而洗清自己的罪过。吴大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告发自己父母与亲人的。

吴拯寰作为四九年前上海比较有名的私营出版家，出版了不少的书，所获较丰，同时还开办一所免费的私人学校和农民学校，可以说在为自己谋利的同时，也为社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吴大昌在告发中说道：“过去我对自己的剥削反动家庭是认识不足的，虽然认识到剥削起家这一

点，但也未从旁督促自己的父母加紧改造。自从红卫兵来我家革命造反，搜出了反动旗（就是过去未卖完的废旧旗帜，尚未来得及处理——冉注）、杀人指挥刀（系其姨父陈肆言所存放，但未必杀过人——冉注）以及还有祖父手里的佃户名册等等，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家里反动的本质。特别像反动旗等是反革命复辟的罪证。这说明解放以来，我的父母亲根本就没有老老实实地进行改造，仍念念不忘旧社会的剥削生活，企图变天。”为了与所谓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不惜将所谓的旗帜和指挥刀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加以夸张。为了一步到位，不惜自污并污人，“特别是解放以来，与反革命分子马希龙也从未在思想上划清界限，交往密切。”同时，还大表特表决心，“从今天起，我除了在思想上与一切剥削阶级严格划清界限外，一定认真改造自己，进一步督促自己父母彻底认识长期以来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可耻罪行以及反动本质，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1966年8月31日红卫兵开始抄吴家，吴大昌为划清界限，彼时写的告发材料，当然说红卫兵抄得好，且说这给他及其父母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并于同年9月12日，让吴大昌立下一份“保证书”：“我向党和组织提出保证，一定和自己的反革命剥削家庭严格划清界限，并经常向党和组织汇报吴拯寰、秦世华平时的言行，还将亲友们和他们的来往随时汇报。立保证人吴大昌”。将父母及往来亲友的言行，随时汇报，这样的“保证书”，不仅是号召你告密，而且是逼迫你告密。隔一段时间如果没有任何动静，你不去汇报，那么这把悬在你头顶的达摩克利之剑——保证书，便会成为你不按保证书行事的罪证。如此一来，你不仅没有解脱之期，还会罪加一等。因此，只有频繁地汇报，从鸡毛蒜皮到栽赃陷害，一股脑儿地汇报上去。而从父母的角度来看，自己儿子成为限制自己自由的线人，这是怎样的一种椎心之痛。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父（母）子之间必须互相告发，以求自保。但这所谓的自保，其实是你永远无法摆脱的梦魇，因为这里面暗藏着一个悖论，是典型的囚徒困境：都不告发自然是最好的，但专政者是不允许的。你告发他，他不告发你，或者相反，都会使自己真正出局，率先陷入困境。于是只有一条道可走，互相告发，而且越告越多，最后彻底铸就一个双输的结局。

高压下的告发，不实之处自是很多，于是在恰当时机来翻案是常有的。1967年2月21日的交待材料就是为了翻案：“红卫兵要我们子女检举揭发。二姐吴继明检举她曾看到三姐吴继麟（已于1953年死亡）将她爱人马希龙（历史反革命）的手枪交给过秦世华（二次抄家均未抄到手枪。关于这事，吴继明已在10月及11月间分别向我社红卫兵及公安人员声明，当时是为了‘立功’，无中生有地胡乱检举的）之后，前文革就策动红卫兵把我们全家人分别隔离写交代，前后历时达十天。”为了救自己于苦海，对于至亲父母也不惜采取栽赃陷害的告发方式，作为同类，我们看到这里，都痛心到无语。但在文革中，像这样丧心病狂的事，并非绝仅有。同一天的交待材料里吴大昌写道：“9月12日我来社后（指吴大昌的工作单位上海文化出版社——冉注），前文革又布置科室开会斗争我。首先江长富等怀疑秦世华曾大量转移金银财宝，并说我是秦世华的小儿子，又住在一起，一定知道这件事，要我检举，以说明我和家庭划清界限。还说如果我能交待秦世华转移的金银财宝，可以把我从反动家庭中划出，其他枝节问题可以不问。”这种威逼利诱，所谓坦白从宽的审案方式，是四九年后历次运动审查，以及要求人们主动检举告密，包括警察审案中的家常便饭。残酷的现实是，你坦白得越多，你在他手中的把柄就越多，情形就会大为不妙，“但当我回答说确实不知道关于秦世华转移金银财宝的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一次室内开的斗争会上，江长富说我的问题快滑到反革命的边缘上去了，并把我知道秦世华将反革命分子马希龙的首饰交给他本人一事说成是参与反革命活动。当时我思想很不通，但在压力下，也不能做答辩，只能勉强承认自己是犯了敌我性质的错误。”这就是搞有罪类推，坦白从宽的这套审查审案方式，最终会弄出的囚徒困境。

吴大昌要与反革命家庭划清界限，只说父母的现在，不揭发父母的过去，是无法让审查他的红卫兵认可的。据我查，三民图书公司出版的书籍中，并无《蒋介石全集》、《汪精卫全集》，但吴大昌的揭发中却说：“我的反革命资本家的父母是靠出版‘三民主义’起家的，反革命的父

亲曾加入过国民党，在‘三民公司’开办初期，又曾出版过《蒋该死全集》（吴大昌有文化，这名字和彼时通行的对蒋介石的蔑称是一致的——冉注）、《汪精卫全集》，为国民党反动派忠实效劳。”“抗战胜利后，吴拯寰又出版蒋该死《中国之命运》，继续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宣传员。”这些罪名，在文革时可致人于死地，但其父于八四年才去世（未查到其母的后续资料），得以善终，也算是奇迹。更猛的揭发还在后面：“在敌伪时期，吴拯寰利用上海各学校不愿意采用敌伪教科书的心理，专门出版中小学补充教科书，发国内（应为‘难’字——冉注）财，还出版各种资本主义国家的侦探小说等书籍，毒害麻痹人民。为了使自己的剥削有靠山，吴拯寰、秦世华通过别人的介绍，把吴大业和我两人名义上过继给敌伪大流氓王永康，过年要我们去拜年。”“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伪教育部，把一部分伪国定教科书的出版发行权让给私商”，吴、秦二人通过关系拿到了这个权利，后来还“到南京和反动派政府的主要官员沈昌焕会面，要求承印有关反动政府编辑的出版物”。一方面说明彼时的教科书是公开竞争的，这为减少党化教育和奴化教育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表明吴拯寰的确有一套自己的经营管理方法，出版生意做得相当好。

至于揭发材料中，提及其父母如何剥削工人，同时放高利贷的说法，就多得不胜枚举。其中还涉及到他们拉拢腐蚀共产党干部，“约在1951或1952年，当时吴拯寰、秦世华为了想多取得新华书店东北分店的进货负责人谢家松（可能音同字不同），请他和他爱人到家来吃饭，还把他的爱人介绍到童联书店工作。”在公私合营之前，吴、秦经营的书店状况良好，但吴拯寰审时度势，于1955年初提出公私合营，将书店并入新美术出版社。

三、告发兄长及众亲友

吴大业是吴大昌的兄长，四九年前毕业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所。1952年，吴大业参与三民图书公司规划出版《红楼梦》连环画，与赵景深、秦瘦鸥、金性尧、翟西华、赵庸耕、吴拯寰、潘勤孟等组成编审组，由潘勤孟执笔，于1954年开始出书，至1956年陆续出版19册（三民图书公司1955年并入新美术出版社）。通过吴大昌的告发材料得知，他那时以青年法学家自居的，想出国继续深造。吴大昌第一次揭发吴大业的十七点，几乎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如在三民图书公司时拉拢分化职工，用法律手段起诉并“排挤”走老职工钱云麒，与瞿世镇一起在四九年前编辑出版“伪考试全书”等。

家中有只微型照相机，于那个在思想上动辄敌特遍布的年代，自然是罪过一桩，不仅吴大业要求其父吴拯寰将其销毁，而且8月31日出版社的红卫兵到吴家抄家时，押着吴拯寰找到了已摔碎的快门和碎片，这问题本来已算明了。但吴大昌说：“关于这只微型照相机的事，我没有在抄家以前向组织汇报，也是我犯的错误。”换言之，该汇报和检举的地方遍布生活中的各个角落，真是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有了这样高的觉悟，自然以后便会无所不告了。

抄家和运动刚开始，吴大业看到社里贴出《勒令反革命分子吴大业》的大字报，吴大业自然在思想上抵触，去公安局和出版局反映大字报所说不实。1967年2月21日，吴大昌也写了申诉书，说有许多所谓事实是红卫兵强迫他说的，要求为自己平反，让其参加文化大革命。但到了1969年1月10日他却说：“吴大业和我在社里接受群众审查后回来几天，吴大业对我说：在社里时因有压力，对杀人指挥刀和血渍毛巾，反动旗作了不真实的交代。关于秦世华叫吴大业去看陈肆言的箱子，看见里面有杀人指挥刀和血渍毛巾，这一事，是编造出来的。还有在解放初期，秦世华曾对吴大业、大姊、大姊夫、二姊谈到，有一包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做生意多余下来的小反动旗，吴大业等要她就毁掉，也是没有这件事的。当时我因为立场关系，相信了吴大业所说的情况。”这样的观点，并非吴大业所独有，吴大昌在1967年2月的申诉材料里也有，但他在这里却推得干干净净，难道他就不怕红卫兵前后对照，将其矛盾处揭露出来么？显然是想全部脱离干系、彻底划清界限所致。因之吴大昌有如下的揭发便顺理成

章了：“社里开展平反工作时，吴大业掀起二月翻案黑风，除了打报告给接管小组外，并准备贴出大字报。”事实上吴大昌在后来的交待材料也专门交待了他与其兄嫂吴大业、陈丽琳一起去出版局和公安局反映情况的事，同时吴大昌还去市革委接待站反映了情况。所谓二月翻案黑风，当然不是吴大业就能掀起的，而是当时大的情势所定。但为了及早脱离干系，什么猛话都敢说，哪管它有什么伤害。

吴大业为了申冤，散发油印传单《吴大业不是反革命》，给上海出版局和上海文化出版社两个单位的造反派各一份。而这传单是由吴大业的外甥姜亚鸣刻写的，此事被人民美术出版社一积极分子告到姜亚鸣的学校里了，还好，似乎没受到相应的后续处理。在告发材料中屡屡被提及的指挥刀，则是吴大昌的姨父陈肆言寄放在他家的，吴大昌说这事全系他母亲在管理，他是并不知晓的。至于告发其他亲友诸事，则只需写下他的交待题目即可：关于姨母秦仁瑞的死、关于手枪问题（“我脑子里印象较深的看到过马希龙一张手拿或者背着卡宾枪的照片，据说这支枪早就交给了公安部门。另外，我提一个要求，应该对马希龙的家里进行详细严密搜查。对他的朋友常峰家里也应该进行搜查。”）、关于我三姊吴继麟的死、关于红卫兵革命造反以前家中的活动（此中涉及所有家人包括保姆）、出售废书两批和一批黄色唱片、关于我二姊夫刘印石的问题、关于保姆潘凤宝的问题（主要说她与马希龙的关系）、关于亲戚寄存箱子的问题（涉及其母及陈肆言、周庆镛）、关于吴继明和吴大业的存款问题、关于吴大业开除钱云麒的问题、关于钱阿太（钱云麒之子，材料中说是钱云麒青年时得过花柳病所致）的死等等，内容还有不少，但多是鸡毛蒜皮，故不一一赘述。

四、告发秦瘦鸥

秦瘦鸥系四九年前上海知名市井小说家，《秋海棠》等书畅销一时，为其赢得名声和物质的双重丰收，因之他与各色人等尤其高官名媛、文艺及出版界著名人士时相往还，其中就包括老舍等人。文革时，他在牛棚中尚有点看书的自由，他将老舍的《离婚》带着去看，被红卫兵小将申斥其为老舍招魂，因为用红卫兵的话来说就是“老舍已经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了”。红卫兵抄秦瘦鸥的家时，抄去很多文物、字画、书籍，八十年代初发还的很少，他看得也比较通脱，懒得计较了。

红卫兵抄秦瘦鸥的家是不是与吴大昌的告发有关呢？现在尚没有直接的证据。像秦瘦鸥这样的旧式文人，被抄家是迟早的事。但吴大昌的告发，至少为红卫兵进一步整治秦瘦鸥提供了炮弹无疑。关于秦瘦鸥，吴大昌所用的标题是“关于秦浩（秦瘦鸥）的历史反革命问题”。其内容不长，因对研究秦瘦鸥不无小补，于是全抄于下：

过去，吴拯寰和秦世华和他只是亲戚上的往来，对他的反革命问题不详细（原文如此——冉注），曾叫他翻译过侦探小说，敌伪时，他自己也因做“秋海棠”小说而出了名。抗战后期，秦浩领了他的一家人到内地重庆，把一个大女儿秦晨留在我家中，要秦世华代为抚养。抗战胜利后，秦浩回到上海，因一时找不到房子，曾暂住在我家几个月。只知道秦浩曾拜了杜月笙做老头子，其他情况不详。后来就做资源委员委（疑为“会”——冉注）金属工业部主任（可能名称不正确），一直到解放，在这一段时间，只知道他家里排场很阔，订小洋房，进出坐资源委员会的汽车。

秦瘦鸥在抗战后写过一本《劫收》，写国民党大员如何趁收复日本占领之地的权利，趁机大捞不义横财，以中饱私囊的故事。从吴大昌的检举里虽然看不出《劫收》里的要员中饱私囊的迹象，但在战后生活普遍下降的情况下，能够获得资源委员会的肥缺，还是很好地体现秦瘦鸥在实际生活中的运作能力。而拜杜月笙为老头子，就像吴大昌说父母要他与哥哥吴大业同拜王永康一样，这不仅是一种风尚，也是非正常社会生存之必须，但这一切无疑为秦瘦鸥的历史反

革命增添了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材料。四九年后在出版《红楼梦》连环画的时候，秦瘦鸥还参与了三民图书公司的编审工作，但吴大昌并无涉及四九年后秦瘦鸥及其家人的情形，大抵是不甚清楚的缘故，而不是什么刻意的回护。

五、自我告密

圣人强调三省吾身，同时也有人强调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自我批评，后者并不始于文革，这是曾国藩的“发明”。曾国藩从1842年他31岁起，每天写“日课册”，名之曰《过隙集》，“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以反省自己。他这种狠批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做法，引得1917年的青年毛泽东叹服：“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曾国藩无非是自我修身，他的《过隙集》的“日课册”也并不准备发表，但到“独服曾文正公”的人那里，就变成了一种拿来整人的道德表演。众所周知，中国是个道德他律很重，而道德自律比较缺乏的国度——因之道德在中国有很深的表演成份——强权者和掌握话语权的人，通过自己不容置疑的权力，命令那些处于弱势的人，要依照他们制定的道德要求来生活，占领道德制高点，祭出杀人利器，成了四九年后历次运动互相整人的常态。

四九年后很长时间里没有正常的法律，即便有，也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有罪类推、自证其罪。这种自证其罪的法律体系，配合道德上所谓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人人被要求自我告密，刺刀见红，自我揭发，脱胎换骨。最通常的说法是群众向组织交心，党员向党交心。古有比干被剖肝见心，今则要你自剖而见你的心红心黑。这样一弄下来，人哪里还有什么个性，什么尊严？这和一头猪这样的低级动物有什么区别呢？吴大昌的家庭决定了他必须污人以及自污，告发他人和自我告密，才能获得一点可怜的喘息余地。这样做了，是否真的能够脱离苦海，主动权并不操在他的手中。

十分不幸的是，吴大昌越是想脱离苦海，苦海越像梦魇和毒蛇一样纠缠着他。1968年5月31日，吴大昌学习“老三篇”背《愚公移山》，背到“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一段时，错背成“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反动派的”。他自己在6月1日的检讨中说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是属于反革命性质的问题”。吴大昌的家庭是旧式的剥削家庭，其父母、兄长都是反革命，但唯独吴大昌不是。原因是红卫兵造反派想进一步利用亦即所谓“争取”他来告发自己的父母及亲戚朋友，让红卫兵造反派找到进一步的罪证来折磨他们，同时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威逼利诱，让其无休无止的检举揭发，使吴大昌成为造反派手中一张打人的牌，成为向他人进攻的傀儡。

吴大昌告发人以自清，还不能满足红卫兵造反派及当政者的要求，因此还需要他不时汇报、交心以自污。我手上保留他所写的六次“思想汇报”，现按时间顺序摘录一些内容，以见其交心自污，自我告密之一斑。“最近我社造反派也贴出了通令，凡是有政历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人，必须彻底交代其反动的罪行，凡是尚未交代而混在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资本家，必须立即交代其问题，这是对有问题的人的挽救和帮助，我坚决拥护。”

1968年6月9日第一则“思想汇报”材料，便是对他此前已经交待过的事情，再进行反复的自我批评，自我交心。“这一星期内，周林笙同志以及同组学习的人员对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帮助，即关于马希龙的首饰箱问题和吴大业的微型特务照相机的问题。”说是帮助，其实完全有可能是无情的批驳，只不过是只能用“帮助”二字来表达对他们的“感激”，否则的话，他便犯下抗拒改造的滔天大罪。交心工作，当然不只是你告发别人，还有你日常做了哪些符合他们需要的事，将这些事说出来，你的交心便有可能获得认可。1968年6月24日吴大昌主要谈的是他如何学习门合的英雄事迹和学毛著的心得。

基于非常强大的压力和必须按时交心的要求，吴大昌在1968年7月7日的“思想汇报”中说：“造反派同志一再动员我，要我揭发反动父母过去所做过的反动罪行，我觉得这是造反派同志对我的帮助，给我以立功的机会。”“为了对反动父母过去所做的反动罪行进行彻底调查，如果造反派需要什么材料，凡我所知道的，我一定提供配合。”“自己如果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必须破‘私’，解决世界观的问题，否则必然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成为不可救药的人。”

这思想汇报，是典型的污人及自污的组合。1968年7月21日，主要谈他每天背诵“老三篇”的心得，同时他说“从我社已经揪出来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其它反革命分子来看，使我清楚地认识到我社自建立以来，也一直存在着剧烈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小撮阶级敌人在走资派的庇护下，窃据着重要的工作岗位，妄图实现反革命复辟，但在我社造反派，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坚决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聚下，都被揪了出来。”由此看来，这样的交心，只是走过场，只不过是重复得势的当权者的声音，反应了其间的权力争斗罢了。

1968年8月18日的“思想汇报”如下：“七·三”及“七·二四”布告，实情是武斗扩大以及武斗中与军队的冲突，但布告中却说是反革命分子等在其间挑拨煽动，要求各地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实质就是告密和交心双重并举，吴大昌自然按照这等模式他污自污以交卷。1968年9月1日的汇报除了讨论苏修叛徒集团对捷克的突然军事占领以外，吴大昌真来了次比较“有特点”的交心：“在星期五（30日），我又犯了一次严重错误，早上乘26路无轨电车的时候，做了一件严重的恶劣行为，对某一女同志进行了污辱，是属于流氓阿飞行为的性质。在无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两年多的今天，我再犯这一错误，说明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没有很好得到改造。这完全是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及过去所看的黄色小说在脑子里作怪。今天牛奶公司的革命工人以及社内的造反派同志对我进行批判教育是对我的挽救，说明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必须加强改造自己，否则必然为社会所抛弃，成为社会的渣滓。”“在我做了这一恶劣行为被揪到牛奶公司的时候，心里也对自己这一行为觉得可耻，觉得无脸见社内的群众。但我立即认识到，仅仅觉得自己行为恶劣可耻是没有用的，必须在认识到错误的同时，把自己这一种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自己的头脑里，彻底清除，加强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吴大昌彼时三十二岁了，尚未婚配，终于被造反派抓住世俗的把柄，让其进一步陷入深渊而不能自拔。1967年8月他曾买了《沙家》的戏票请同社财务科的刘月珠女士看戏，发展感情，以便分得房子，从家搬出来，与反革命父母划清界限。可惜没有成功，不然他或许不会犯这桩流氓罪了。

六、一点思考

我以吴大昌告密个案为例，加以我对文革的综合认识，说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灾难，是有把握的，但是否绝后，我不敢打赌。在一个专制国家，不稳定的因素甚多，社会运转及相关的走向，都是不确定因素，没有一个人可以准确猜度它的未来。专制制度必然依靠老百姓的互斗，人与人之间的告讦，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内耗，机构与机构之间的互相制约，来使如此残酷的政权运转相对正常，而不被轻易地推翻和血洗。因为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专制的历史就是如此血腥。

共产党依靠古田会议及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使每一个军人都受党的制约，任何一次偏离或者不满，你都可能命丧黄泉，既而使军队完全成为党的私产。于是公开喊出党指挥枪，用笔杆子来洗持枪杆子的脑袋，使军队完全成为一架没有头脑的杀人机器。共产党把他的军事建制方法，运用到整个中国和平时期的统治中，共产党员遍布每个角落，从大都通衢里的街道办、居委员，到乡僻之野的村民小组，无一处没有共产党员，真可谓无孔不入。如此一来，党员乃至团员，都成了告密集团大军的一员。因为像这样的专制统治，不依靠这样的方式，是不

可能统治得如此“滴水不漏”的。因此毛统治时的政府，被我称为“铁桶政府”。既是无孔不入，遍布大街小巷、乡村田野，因之使得四九年后的不少告密，特别是文革告密，都带有群众运动的性质。尽管由于告密的隐秘性质，表面波浪不兴，但漩涡深处的暗流从来都没有停止涌动一样，告密于中国大地时刻发生着。每个告密者，从小都像少先队一样“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告密。

被打成极右以及现行反革命，最终在狱中被折磨而死的、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冯元春女士，曾在一九五七年说过，对于民众来说，党团员都是秘密警察。纵观共产党这几十年的统治历史，尤其是文革前近三十年的残酷统治，无不是对冯女士这一说法的残酷证明。不特如此，告密之所以常常成为群众运动的一部分，不只是有数量极其巨大的党团员的积极参与，更主要是从上小学就受党化教育、奴化教育，佩带红领巾，让他们“时刻准备着”，准备着与坏人坏事——这坏人坏事大半只是共产党为整肃异己的捏造——作斗争，标准的姿势便是手拿红樱枪，像杜撰出来的刘文学一样去抓偷辣椒的地主分子。换言之，小孩一上学便成为他们培养告密者的对象，许多小孩为了尽快入少先队，佩带红领巾，不惜使尽一切手段，当然包括打小报告。由少先队、团员到党员的梯队培养，使得告密者的人数巨增，让共产党的假想敌以及捏造出来的异己分子无处藏身。即便做到了这样狠毒的地步，内心虚弱的独裁者还是不放心的，他们挑起群众互斗，还给你戴上高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让大家人人自危，于是告密成风。群众的眼睛那么雪亮拿来干什么？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任何一颗带异动倾向的、与脸部不能保持一致的斑点，都会被雪亮的眼睛识破、放大，告发出来，使你无处藏身。

四九年后告密从广度和深度上来说，都是群众性的；而文革时的告密，波及面之深广，影响面之巨大，告发手段之无所不用其极，都是一场群众运动。另外，告发父母，以及自我交心——自我交心虽在清代雍正的《大义觉迷录》里有所号召，但哪能与四九年后的无所不在相比——都是四九年前几千年漫长的社会里，很少使用的告密手段。以我对中国告密史的初步研究来看，四九年后专制政权尤其是文革所使用的告密手段，所告发的领域，告发的机构及个人，都是空前的。单以吴大昌此宗告密个案为例，你拿历史上任何酷烈的告密个案与之相比，都会为之逊色。而吴大昌告密个案，在文革时是一种常态。即便非文革时期，此种告密个案，也并非个别，同时远非告密个案中登峰造极者。而这一切都等待着负责任的学者进一步的挖掘、展示和研究。

2006年6至7月于成都

~~~~~

## 【研究报告】

非理性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和他的情欲、妄想和潜意识（下）

• 宋永毅 •

毛晚年的“被迫害妄想症”还带来了一个不容忽略的副作用：他的偏执型人格障碍。《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中将偏执型人格障碍叙述为：

- 1.广泛猜疑，常将他人无意的、非恶意的甚至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或歧视，或无足够根据，怀疑会被人利用或伤害，过分警惕防卫。
- 2.将周围事物解释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阴谋”，并可成为超价值观念。
- 3.易产生病态嫉妒。
- 4.过分自负，若有挫折或失败则归咎于人，总认为自己正确。
- 5.好嫉恨别人，对他人过错不能宽容。

6.脱离实际地好争辩与敌对，固执地追求个人不够合理的“权利”或利益。

7.忽视或不相信与患者想法不相符合的客观证据。因而很难以说理或事实来改变患者的想法。

患者的症状至少要符合上述项目中的三项，方可诊断为偏执型人格障碍。偏执型人格的人很少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偏执行为持否认态度。（55）

毋庸讳言，毛泽东晚年的偏执型人格几乎符合以上所有的七个特征。并且，他“很少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偏执行为持否认态度”。如上所述，毛对贺龙的表忠心“过分警惕防卫”，又把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正常的国策建议（设国家主席）当作是值得怀疑的“抢班夺权”，“解释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阴谋’，并可成为超价值观念”（“防止反革命政变”）。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老年人性格上的表现，常是青壮年时期性格的加强和发展。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唯意志论”者，又是一个激动型的诗人。他身上本来就存在的非理性的唯意志和失控的激情在他的晚年发展成为偏执的病态。自然，心理上和行为上的变化，在年轻时尚有足够的自制力，控制某些性格向极端倾向发展。到了老年之后，自控力变弱，原来比较隐蔽的性格特征，届时可以完全暴露出来。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毛泽东和他的“敌人们”的冲突的起源和发展，常常会发觉冲突的骤然升级不是因为什么“理论分歧”，而是一些本来相对来说无关紧要的事引发的意气之争。在许多场合，毛突出地表现出了“脱离实际地好争辩与敌对，固执地追求个人不够合理的‘权利’或利益”的偏执人格的第6个特点。毛在文革中一直说：他和刘少奇的重大理论分歧是爆发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56）毛和刘在“四清”的一些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看法，刘少奇在毛讲话时插了话。但是据当时会议的参加者回忆：他们只是各说各的，没有任何直接的冲突。不久，会议闭幕了，邓小平出于照顾毛的身体，建议他可以不参加闭幕式。不料毛立刻“将他人无意的、非恶意的甚至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或歧视”，失去了自控。不仅勃然大怒，还拿出了《宪法》和《党章》，气势汹汹地兴师问罪，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剥夺了他的“言论自由”。甚至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57）从此，毛下定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使毛泽东把刘少奇等人升级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来炮轰发生在1966年8月4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回到北京，对他同意的派工作组的做法出尔反尔，当众指责挖苦刘少奇：“你在北京专政嘛，专的好！”当毛语带威胁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时，刘忍无可忍地表示：“无非是下台，有五条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引者注）”。（58）本来，这一争论错误的一方是毛泽东，因为他食言而肥。但是，毛的“过分自负，若有挫折或失败则归咎于人，总认为自己正确”——他的偏执性人格的特征使他立刻将错就错，扩大事态。马上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不仅把刘的问题扩大到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马上牵连到成千上万的干部；又立刻改变大会议程，改组了政治局，确立了林彪为接班人。

毛泽东的这种容易被一些小事激怒，“脱离实际地好争辩与敌对”的偏执型的人格障碍，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就被他的卫士长李银桥注意到了。李甚至认为：如果没有彭德怀的过于梗直的赌气和毛的进一步意气用事，或许庐山会议的结局不至于把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李有如下的回忆：

对这份意见书，毛泽东开始并没有当作太大的事，也就是个一件呗。形势座谈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厉害，毛泽东开始也只是认为彭德怀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并没有太高的纲。毛泽东站上一看，嘟囔：“彭总没有来？”我在他旁边指指，毛泽东才发现彭德怀坐在最后一排，没有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道坐前排，而且头剃光了，很亮。毛泽东吮吮下唇，没说什么，可以

肯定心里不太高兴。

会散以后，彭德怀“与毛走了个对头”。毛泽东提议和彭德怀谈谈，但是彭拒绝了：

彭德怀涨红着脸甩手而去，脚步始终没有停一停。毛泽东怔了怔，吮吮下唇，继续下山。就这样不欢而散。当时许多中央首长看到了这个场面。……彭德怀一赌气，引起一些人的公愤，在毛泽东那里讲了一些话，结果事情变大了。（59）

作为至今还很热爱毛的李银桥，他的回忆中自然有不少为毛开脱辩解之词。但从他传神的毛两次“吮吮下唇”的极不高兴的动作仍中可以看到：毛非常注意这些同志间意见不同时的态度和小事——往往是这些事，而不是什么重大的理论分歧——决定了他对他的敌人们的打击和处理。这就不能说不和他的偏执型的人格障碍无关了。

从精神病病症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晚年的很多多疑残忍的“党内斗争”绝非是一种标新立异和危言耸听。实际上，不仅毛泽东，在整个发动和领导文革的中共上层集团中，有病态人格和精神病病症的人绝不是少数。例如，江青早在1959年就被多名专家诊断为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60）康生“建国后一段时期……被毛泽东冷落，中共许多领导大多熟知其整人善变的习性，同他疏远，所以他一直称病韬晦、深居简出，而且患了很重的精神病。当时康生的病情挺严重，有幻视、幻听的症状，明明窗明几净，可他偏说有壁虎在爬动。”（61）至于副统帅林彪，多名医生（包括他的保健医生）都诊断他精神有问题。文革初期李志绥去为他检查身体，一看到他就认定“是一个精神上不健全的人”。（62）法国学者皮埃尔·阿考斯和瑞士学者皮埃尔·朗契尼克在1996年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病夫治国》。在书的序言里他们写道：“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些时候，疯子，能见到幻像的人，预言者，神经官能症患者和精神错乱者，曾经起过重大作用，而且不仅仅是在偶然的机会使他们生而为王的时候。通常，他们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63）——这正是为这群程度轻重不一的精神病患者所领导的混乱的文化大革命的绝妙写照。

### 三，幻想和潜意识：在自欺欺人中干革命

缺乏想象力的领袖人物很难开拓新的局面，取得划时代的成就。但沉溺于幻想中的领袖可能把国家作为巨大的实验室，使整个民族陷入灾难之中。不幸的是：毛泽东正是后者。

很多晚年毛泽东的研究者在解释他的错误时常常把缘由归结为他的“理想主义”，但是他们忘掉了：虽然理想和幻想同为非理性因素，但是符合客观实际和社会规律的理想容易变为现实，不符合客观实际和社会规律的理想只能是空想和幻想。幻想是人抓住现存事物的某些方面，对它们进行观念的加工，用观念的联系代替了事物之间客观的、真实的联系，把这些个别的方面加以夸大而虚构出来的东西。毛泽东的问题并非是他的理想主义，而是空想主义和幻想主义。如果说1958年大跃进中毛凭籍着“一天等于二十年”、“人又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荒唐的口号来“超英赶美”，妄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表现了他经济建设中游离现实、陷入梦幻的空想主义；那么，他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企图通过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不断革命”和“斗私批修”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建成一个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社会，则突出地表现了幻想对他政治实践的渗透。

在人类的正常生活中，幻想具有缺失补偿的积极作用，是一种正常的精神现象。但是，当一个人把幻想一味当作现实，便成为一种精神病症。如同正常的人可以在空中想象出一座城堡，而精神病人却真的要搬进那座城堡里去住！在晚年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已不难发现他常常沉溺于幻想之中的症状。据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8年，毛泽东来到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为主席准备文娱活动，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想了想，说：还是看场《白蛇传》吧。结果却发生了如下的故事：

毛泽东是很容易入戏的，用现在的话讲，叫“进入角色”。一支烟没吸完，便拧熄了，目不转睛地盯看台上的演员。他烟瘾那么大，却再不曾要烟抽。他在听唱片时，会用手打拍子，有时还跟着哼几句。看戏则不然，手脚却不敲板眼，就那么睁大眼看，全身一动也不动，只有脸上的表情在不断变化。他的目光时而明媚照人，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情思悠悠。显然，全是进入了许仙和白娘子的角色，理解他们，赞赏他们。特别是对热情、勇敢、聪明的小青，怀着极大的敬意和赞誉。唱得好的地方，他就鼓掌，他鼓掌大家立刻跟着鼓。

然而，这毕竟是一出悲剧。当金山寺那个老和尚法海一出场，毛泽东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甚至浮现出一种紧张的恐慌。他嘴唇微微张开，下唇时而轻轻抽动一下，齿间磨响几声，似乎要将那老和尚咬两口。

终于，许仙与白娘子开始了曲折痛苦的生离死别。我有经验，忙轻轻咳两声，想提醒毛泽东这是演戏。可是，这个时候提醒已失去意义。现实不存在了，毛泽东完全进入了那个古老感人的神话故事中，他的鼻翼开始翕动，泪水在眼圈里累积凝聚，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转啊转，扑簌簌，顺脸颊滚落，跌在胸襟上。

糟了，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我忧心地用目光朝两边瞄，身体却不敢有大动作，怕吸引别人更注意这里。还好，观众似乎都被戏吸引了，没有什么人注意台下的“戏”。

可是，毛泽东的动静越来越大，泪水已经不是一颗一颗往下落，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淌。鼻子堵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附近市委领导的目光朝这边稍触即离，这已经足够我忧虑。我有责任保护主席的“领袖风度”。我又轻咳一声。这下子更糟糕，咳声没唤醒毛泽东，却招惹来几道目光。我不敢作声了。

毛泽东终于忘乎所以的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泪水，擤鼻涕。到了这步田地，我也只好顺其自然。我只盼戏快些完，事实上快完了，法海开始将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就在镇压的那一刻，惊人之举发生了：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天哪！我猝不及防！他的腰带在坐下时已被我解开，在他立起身那一刻，裤子一下子脱落下来，一直落到脚面。我像被人捅了一棍子似的，纵身扑向前，抓住他的裤子，一把提上来。我的思维全停止了，只剩下弥漫的不着边际的自责和惶恐，用一双颤抖的手，匆匆而笨拙地帮他系腰带。我没有保护好领袖的形象，我为此不安，难过了很久很久。

毛泽东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他甚至毫无感觉掉裤子。他仍然在剧中，大踏步向舞台走去。全场的鼓掌声终于将他唤醒。他稍一怔，也跟着鼓起了掌。我松了口气，主席回到现实中了。

但是，他从不善于掩饰自己的好恶。我的记忆中，他是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蛇”握手。

他没有理睬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64〕

原来只是看一出戏，结果毛完全进入了戏中的虚拟世界。不仅动情大哭，还拍案而起，以致掉了裤子，大失仪态。如果说这些还是可以理解的“进入角色”，那么他对于戏中人物“反面人物”法海的仇恨：从看戏时的“齿间磨响几声，似乎要将那老和尚咬两口”，一直到被掌声“唤醒”后接见演员时，仍不“理睬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便已经不可理喻，只能用他的幻想症状来解释了。

当然，我们从上面的分析中已经得知毛在晚年早已是一个精神妄想症患者，对他有的沉溺于幻想的人格特征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他晚年的翩翩幻想，还会发觉这些常常带有自欺欺人的特点。例如，1959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上庐山开八届八中全会前，回访了故乡韶山。在那里，他亲耳听到了他的乡亲们对他大跃进的抱怨，并亲眼目睹了“公共食堂”的惨状。他也听到了一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干部对大跃进已经出现的恶果的汇报，并准备上山反“左”。然而，面对这种极为困难、悲哀的景象，毛泽东却马上接二连三地吟唱出了“喜

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1959年6月28日《到韶山》）和“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1959年7月1日《登庐山》）。在当时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全中国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毛泽东已经听到了来自下面有关大饥荒的实情汇报，也表示了自己不再吃肉与民共苦。但是在他的诗中还是一番“红霞万朵百重衣”和“芙蓉国里尽朝晖”（1961年《答友人》）的歌舞升平的景象。同当时中国老百姓的悲惨处境和发自他们肺腑的悲怆呼唤相比——比如，彭德怀到湖南考察时收集的当地流传的民谣：“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值得指出的是：这是在毛泽东知道了民间真情后的诗歌。这固然是毛的文学幻想，但也充分说明了他幻想的自欺欺人的特质。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毛在晚年在许多方面本能地、无意识地欺骗自己，创造并维护着他个人需要的令人愉悦的幻景。

进一步分析毛泽东赖以发动和推进文革几个主要的道德依据和理论情结，会对他的这种自欺欺人的无意识或潜意识心理特质有更有兴趣更深入的理解。毛泽东一直申明并坚信：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符合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即便在他临终之际，在实际上已经认识到文革的失败时，他在看到电影《难忘的战斗》里人民解放军入城，市民和学生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夹道欢迎的镜头时仍老泪纵横，表现出他对于他完全符合人民利益的文革大业的“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感叹。（65）由此可见，“人民”是他发动文革的第一个最主要的道德依据和理论情结。

确实，毛在发动文革时用了大量的“人民”和“人民利益”作为他的道德依据。其言之多，其情之诚，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欺骗”两个字来解释。或至少毛在进行这些道德包装时，他是本能的和下意识的。例如，1966年6月，正值文革风云如火如荼之际，毛泽东远在韶山写下了《七律·有所思》。以诗言志，表达了自己发动文革的心迹。他写道：“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66）如果说前两句写的是大中学校迅猛掀起的革命浪潮，那么后两句便抒发了毛的政治理想。在这里，毛用了一个巨大的集合名词“人民”。一个月后的7月8日，毛在那封给江青的心中又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这里的右派政变，显然是缠绕于毛心中的“反革命政变”的妄想。（67）（7月16日，毛在武汉畅游长江，面对狂热的“人民群众吹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欢呼：‘人民万岁！’”（68）8月18日，毛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上同林彪的谈话时还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69）对于毛的《七律·有所思》，大陆学者高华作了如下的精彩阐释：“当然，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70）作如是观，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索毛林的对话：是谁发动了“这个运动”来推动“人民”的“思想革命化”？答案还是毛本人。因而，尽管毛在高呼“人民万岁”的那一刻完全可能是真诚的，下意识的，甚至连他自己也被感动了。但另一方面，对他高呼“万岁”的“人民”是归他代表、由他领导的和“运动”的。这一点，即便在他的无意识中也是有非常清楚直接反映的。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无意识并不是人们对客观对象根本没有一点认识的反映，而是对某种对象不自觉的、不由自主的反映的认识。一句话，无意识是人们在反映时一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的认识，相当于“下意识”。（71）而在毛泽东脱离了这样的自欺欺人的语境和环境时，对于他信誓旦旦的“人民”和“人民利益”还是有过清晰的表述的。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最近回忆道：“实际上毛这个人无话不讲，他公开说，我们现在就是搞愚民政策，我们现在就是训政时期”——说到底，“人民”和“人民利益”不过是毛泽东的“愚民政策”的一个巧妙的道德籍口而已。（72）

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追溯毛泽东的“人民”情结的底蕴，我们还会发现：这其实是他的潜意识里的“帝王情结”的外化和包装而已。1976年元旦，在批判“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

毛泽东早已经是病入膏肓，苟延残喘之身。但他却通过《人民日报》高调发表了他1965年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词。其中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词句，夸张地表现了诗人的唯意志论和“万物皆控于我”的意识。而后一首词中所描写的“鲲鹏展翅九万里”、“背负青天朝下看”的艺术形象，并不像有的权威所解释的那样是什么“中国人民”，明显地是诗人自己。联想到毛泽东发表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沁园春·雪》中蔑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自信“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帝王情结”，他在时隔20多年之后所极力讴歌的“鲲鹏”，其实也是一种“马克思加秦始皇”式的自我感觉。“鲲鹏”者，毛泽东也。如果说伴随着《沁园春·雪》的发表，延安唱起了《东方红》，毛泽东欣然接受了“人民大救星”的美誉；那么，伴随着《念奴娇·鸟儿问答》的写作，华夏大地上的个人崇拜登峰造极，天安门城楼成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广场上激动若狂、山呼万岁的百万“红卫兵”之时，他的脑海里肯定会浮现出“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的君临天下的感觉。不过当他决定在1976年年初发表这两首词时，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我死后，可能不出一、二年，长了不出一、二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73）简言之，他在现实中是当不了“人民”的代表了，但是他仍然要在他的文学幻境中实现——这又是一出自欺欺人的政治秀。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第二个道德依据和理论情结恐怕是“巴黎公社”了。毛对于“巴黎公社”的钟情可以追溯到1926年3月18日他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所作的演讲〈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74）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又用“巴黎公社”为理论武器整过彭德怀。（75）文革之初的1966年7月和8月，毛曾多次用“巴黎公社”作为他未来新的国家政权的模式。他曾把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写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76）“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77）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也这样提到巴黎公社：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78）

1966年11月，在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时，他身边的亲密战友林彪代表他讲话说：

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善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79）

1967年1月31日，《红旗》杂志在一月夺权的高潮中发表提名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社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80）其实，聂元梓等人揭发北大校长陆平的大字报，和巴黎公社的国家机构改革是风马牛不相关的事。当年被毛泽东斥责的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就百思而不解，对伍修权说过：“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

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81）毫无疑问，毛泽东只是利用这张大字报来阐述他发动文革的理论依据和道德基础罢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毛泽东把“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通过群众监督和撤换官僚，给予群众更多的民主权利作为文革的一个目标和道德依据时，他本人也可能是充满着一时的革命正义感（甚至为之感动的）。这样的民主和权利的许诺，对于发动千百万青年学生和普通群众参加到文革初期的造反洪流之中，无疑是有着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和吸引力的。

然而，时间很快就证明了毛泽东的“巴黎公社”的情结不过是他一个叶公好龙式的正义幻想，抑或他发动群众投入残酷的党内大清洗时的一个道德的海市蜃楼。1967年2月5日，上海市的造反派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建立了自己的新政权组织叫“上海人民公社”。虽然这是张春桥揣摸到了毛泽东关于“巴黎公社”的思路后的产物，但是它毕竟是中国第一个省一级的大城市的“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形式。《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说：目前由各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群众代表，与驻军负责人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的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但是最终目标是：“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做官当老爷的权利。谁要脱离群众，包办代替，甚至压制群众，专断独行，就必须随时撤换清洗”。（82）应该说《上海人民公社宣言》阐述的“崭新权力形式”的构想，是符合毛泽东反复宣称的反官僚主义、追求政治平等、恢复巴黎公社伟大理想的文革目标的。但是它却意外地遭到了毛泽东的激烈批评：“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毛甚至公开贬低他一贯倡导的公社说：“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不久，毛又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说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83）——一言道破天机，原来毛泽东对巴黎公社的全民选举的民主新政体的憧憬，不过是他无意识中的幻境。一旦他意识到实现这样的目标会最终威胁到他的政权，他便清醒地放弃了。对毛泽东来讲，核心永远是一个“权”字，而不是什么革命理论和道德依据。只要他清除了党内异己，夺回了旁落的大权，他想到的便是立刻恢复那集权专制的党，并使之更加集权，更加专制，更加法西斯化。于是，“上海人民公社”变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巴黎公社的原则顷刻间变成了故纸堆里的垃圾。革命委员会的产生原则，是在“大联合”、“三结合”的基础上由上级批准，与过去的任命制没有区别，而与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就相差万里了。所以不是无实质意义的名字问题，而是有重大实质意义的政体形式问题。如同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在分析这一事件时所指出的：

以巴黎公社为模式来重新组织政权的理论产生了1967年2月那个毫无结果的“上海人民公社”，这是更为激进的毛泽东主义首领们根据马克思关于1871年巴黎公社事件的分析的理解，试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尝试。可是，它从一开始就不是完美无瑕的。上海人民公社在历史上只存在了短暂的19天，它的结束标志着毛泽东主义者从“文化大革命”这一空想目标开始后退，也是以“革命委员会”为基础重新建立中国政治生活的曲折过程的开始。……如果说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一场悲剧，那么，上海人民公社是否只是一场笑剧呢？（84）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美国学者没有忘掉对毛之所以要在文革一开始时倡导巴黎公社的心理分析：

马克思主义关于公社模式的原理是否曾经（或将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这是一个颇有疑问的话题。但是，毛泽东主义者对巴黎公社的赞扬不仅仅是具有暂时的理论和历史的意义。毛泽东主义者求助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不仅是为了重新确立他们在政治上和思想意识上的权威，而且是为了把毛泽东确立为马克思的真正继承

者。因为，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乞灵于由马克思所总结的巴黎公社的革命传统时，他们就超过了俄国人，而直接向被马克思称为是“作为新社会的的光荣的先驱将永远受到纪念”的巴黎工人学习。在这种跨越俄国人直接向巴黎人学习的过程中，毛泽东主义者明确地排斥了俄国革命的许多方面，或至少（稍微隐蔽地）谴责了俄国革命在当代引起的后果。……是毛泽东解决了俄国人没有能力解决的理论问题和革命实践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较高的阶段”。……因此，毛泽东主义探究马克思主义传统就不仅具有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而且具有更重要的心理学方面的意义。（85）

确实，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洞悉一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道德依据的自欺性质会更有趣一些。心理分析学认为：潜意识或无意识和意识组成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存在。人的精神活动常常在它们中间寻求平衡的。潜意识或无意识是意识的深层部分，包括原始冲动和本能以及各种欲望，由于社会标准不容，得不到满足，被压抑到无意识中。每当人的意识以及欲望受到挫折时，人就会下意识地启动“自我防御机制”以保护自己，例如：转移/替代，合理化/文饰，反向（以相反的行为表现），歪曲，幻想，推诿，补偿，升华等等。由于这种自我保护是在无意识水平进行的，便带有自欺欺人的性质。例如，在毛泽东黑暗的心灵深处，显然自视为高于“秦皇汉武”的千古一帝。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党的理论实践又绝不允许他公开称帝。他只能下意识地启动“自我防御机制”以保护自己：1）通过“压抑”把“帝王情结”藏到无意识中去；2）启动“转移/替代”，用另外一个目标替代原来的目标，即采用冠冕堂皇的“人民”的集合名词来替代他的帝王情结；3）再用“合理化/文饰”，自命为“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从而采用错误的推理使自己不合理的行为合理化。再如，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对“巴黎公社”的憧憬也充分表现了他把自己不合理性的做法通过某种自欺性程序变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的心理过程。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并铲除一大批党内异己的文革显然是不合理的。但是他通过一系列“自我防御机制”保护甚至欺骗了自己：1）“压抑”：把他与刘少奇之间无原则的“权力斗争”藏到无意识中去；2）“转移/替代”：用另外一个光明正大的目标替代原来说不出口的目的，即采用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新政体的改革来替代；3）“合理化/文饰”：用充满道德感召力的“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诉求使冷酷的权力斗争合理化。不过，在毛泽东粉碎他自己的“巴黎公社”之梦的过程中，他的“自我防御机制”还多走了“反向”第四步，即他的“自我”为了控制或防御某些不被允许的冲动而有意识地作出相反的举动。如他最后公开贬低“巴黎公社”的不适用和嘲笑全面选举的幼稚便是这种表现。

记得毛泽东1955年在嘲笑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时说：“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86）透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这句话作为他自己的非理性心态的写照恐怕更为恰当一些。

注释：

1 有关本文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定义，可参考下列中英文著作：Richard Wolin, *The Seduction of Unreason: The Intellectual Romance with Fascism: From Nietzsche to Postmoder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John Dunn, *The Cunning of Unreason: Making Sense of Polit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Jonathan Baron, *Rationality and Intellig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吴宁《社会历史中的非理性》，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胡敏中《理性的彼岸：人的非理性因素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夏军《非理性的世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

2 Edgar 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71. p.175.

3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第508—509页。



- 4 陈小雅《中国“丈夫”：毛泽东情事》，香港：共和（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337—338页。
- 5 黄峥《王光美访谈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00页。
- 6 寒山碧《从“张玉凤回忆录”探讨她与毛的特殊关系》，载韩作编《毛泽东情史》，香港：东西文化实业出版公司，1989年，第154页。
- 7 毛泽东《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1967.2.3）》，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
- 8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271页。
- 9 巴人《毛泽东震怒——震动高层的“窃听事件”》，载《北京日报》2007年6月19日。
- 10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354—355页。
- 11 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
- 12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388—389页。
- 13 梁壁辉《“有鬼无害”论》，载《文汇报》1963年5月6日。
- 14 《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
- 15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354—355页。
- 16 郭金荣《毛泽东的黄昏岁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第161—164页；第195—198页。
- 17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343页。
- 18 《反叛的御医：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和他未完成的回忆录》，香港：开放杂志社，1997年，第29页。
- 19 见丁抒《毛泽东和他的女译电员》，载香港《开放》杂志2000年4月号。
- 20 文革开始后，由于原来处理军委日常事务的罗瑞卿、贺龙等人先后被打倒，军委成立了一个由叶剑英、杨成武和肖华组成的“三人小组”，经毛泽东的批准处理军委日常事务。这对于林彪集团，事实上是一种制衡。
- 21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464页。
- 22 张云生《毛家湾纪事：林彪秘书回忆录》，香港：存真社，1988年，第87—88页。
- 23 黑雁南《十年动乱》，香港：星辰出版社，1998年，第210页。
- 24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第672—677页。
- 25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508页。
- 26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
- 27 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430页。
- 28 《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内幕》，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653—654页。
- 29 范达人《梁效往事》，香港明报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第19—20页、39—40页。
- 30 沈容《红色记忆》，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第206—207页。“我所见所闻的几位毛泽东身边女孩”是作者在网络上发表她全书摘录时的标题。
- 31 见中共中央1976年2月2日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陈锡联同志任职的通知》。文件中说：“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当时叶剑英并没有请病假，而毛泽东却断定他“生病”而夺了他的军权。
- 32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46页。
- 33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05年8月号。张玉凤的这一回忆现在越来越被研究者们认为是真实的。
- 34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46页。另外见郭金荣《毛泽东的黄昏岁月》，第1

- 19—120页。
- 35 凌峰《有关张玉凤的补遗》，载《闲话毛伯伯》，香港：当代月刊出版社，1993年，第80—81页。
- 36 郭金荣《毛泽东的黄昏岁月》，第185—187页。
- 37 见《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中发〔1976〕24号，1976年12月10日。
- 38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561页。
- 39 余英时《在塌上乱天下的毛泽东一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载《反叛的御医：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和他未完成的回忆录》，第84—87页。
- 40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588页。
- 41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221页。
- 42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105页。
- 43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
- 44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朱德纪要》，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
- 45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1980年10月16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
- 46 类似见解，可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94—95页。也见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449页。
- 47 华飞《“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载《华夏文摘增刊》，第314期（2002年1月18日）。又见舒云《林彪画传》，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第535页。
- 48 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第351页。
- 49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1—72页。
- 50 见王年一、何蜀《重议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原载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第2001年第1期。
- 51 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第402页。
- 52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1972年1月13日，中发〔1972〕4号。
- 53 权延赤《红墙内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2页。
- 54 《反叛的御医：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和他未完成的回忆录》，第237页。
- 55 《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另外，该标准1989年第一次公布，全书的电子版可见：<http://zgxl.net/xlzl/cjxlb/ccmd2r.htm>
- 56 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73页。
- 57 郭家宽编《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9年，第77页。
- 58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126—127页。
- 59 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台北：晓园出版社，1991年，第56—59页。
- 60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246—248页。
- 61 王凡、东平《五进中南海：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载《传奇·传记文选选刊》，2006年第6期。
- 62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436页。
- 63 （法国）皮埃尔·阿考斯，（瑞士）皮埃尔·朗契尼克著，郭宏安译《病夫治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 64 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台北：晓园出版社，1991年，第48—50页。
- 65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51页。
- 66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55页。
- 67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 68 《人民日报》，1966年7月26日。
- 69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上同林彪的谈话》，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
- 70 《从“七律·有所思”看文革的发动》，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 71 冒从虎、冒乃健编《潜意识 直觉 信仰》，石家庄市：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0—71页。
- 72 朱健国《李锐先生访谈录》（2007年10月1日），原载《议报》第322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 73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05年8月号。
- 74 载《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3页。
- 75 见毛泽东〈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48页。
- 76 《毛泽东对中央负责人的讲话》（1966年7月），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
- 77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4日），同上。
- 78 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
- 79 《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3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
- 80 载《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
- 81 鲁彤、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长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5页。
- 82 《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原载1967年2月7日《解放日报》。
- 83 《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1969年，第667—672页。
- 84 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陈铭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6—117页。
- 85 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第133—134页。
- 8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

【往事追忆】

隔离审查进“牛棚”

• 戴维堤 •

（编者注：本文摘自《逝者如斯》一书中有关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不到三年，历史重演，真是何其相似乃尔！正如1966年红卫兵、造反派们响应伟大领袖“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积极造反，把许多老干部们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一样，1970年，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按照正、副统帅的命令，派出一个个军管会，积极展开了大规模的“批清运动”，矛头直指向文革中为毛泽东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红卫兵、造反派们，并把他们一个个打成了“5·16”分子和坏人。

利用学生整干部，利用工人整学生，利用军人整工人，又利用一部分军人整另一部分军人，最后联合起来整学生，这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变成了一部绞肉机”，这话忘了谁说的了，说这话的人活该当死，但这句话让他说对了。

自古枪打出头鸟，造反没有好下场，政治斗争无诚实，宫廷里面无真理，胜者王侯败者贼，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些民间俗语小时候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时也略知一二，怎奈到了关键时刻，忘了。

既然造过反，就应付出代价。果然，历史的惩罚到来了，绞肉机的刀片很快地转到了我辈的脖子上。

1970年12月26日伟大领袖生日这天，我和738厂的造反派头头们一个个地被关了起来。当然，“私设监狱”名称不雅，美其名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没过几天，尹聚平也被作为所谓王力的“黑秘书”和“7·20”事件的参加者被隔离审查。那天正好是我儿子的一周岁。在这一点上，军管会还真是有政策水平，因为据说世界各国在母亲被关押时，孩子不能小于365天。

与尹聚平同时被隔离审查的一个从部队转业来738厂的男子汉钱直平，不几天便被军管会逼得上了吊，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抛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以上这些，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我被隔离审查后不久，就被拉到厂里陪斗一次。这天是1971年的3月17日，738厂的军管会组织了本地区的批斗“5·16”分子大会。也不知军管会用什么神通广大的魔术，几天之间，便撬开了738厂许多人的嘴。他们一个个被押上台去，低头弯腰三鞠躬，痛苦流涕而又口苦悬河。不但一个个承认了自己是填了反革命登记表的“5·16”分子，而且交待出了几十、几百个发展对象。我想起那天的场景，真是滑稽。文革中我几乎什么场面都见过，可唯独未见这种场面。

在军管会的安排下，已经缴械投降的头头们一个个走上台去交代问题。站在台上的交待人在交待他发展的“5·16”分子时，显然是按军管会的要求，用×××（念某某某）代替姓名。这样坦白交待者只好说：“我发展了×××，×××，××，×××，××，×××……”。会场的高音喇叭有放大功能，这种绕口令的 美妙声音响彻了738厂的上空，陶醉了坐在主席台上的军管会首长们，但却吓坏了台下的数千名职工，也惊呆了周围马路上的一切行人和车辆。于是，一切都凝固了，人们侧耳静听，不知道738厂大院里上演什么好戏。我站在台下看着手表，洗耳恭听着这一连串的迟迟不停的“某某某”。我的天哪！有一个头头竟然连续说了十分钟的“某某某”。按两秒钟说一个计算，他一口气交待出了300多个“5·16”分子。

此后不久，在军管会的强大攻势下，那些“某某某”们也一个个乖乖地“缴械投降”了。不几天，738厂就抓出了一千多个“5·16”分子。军管会主任“王大刀”在全厂大会上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伸出四个手指大喊：“同志们，谁说738厂没有‘5·16’分子？现在已经四位了！四位了！同志们！”

我的好友张君，是厂革委会人事组织负责人，与我在北航的身份差不多，不过他不管保卫工作。张君为人忠厚老实，甚至有些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他无造反派的气魄，但有造反派的

观点，如此而已。他为人正派，被委以重任。抓“5·16”一开始，我曾对他说过不要怕，更不要胡说八道。

张君患有慢性心脏病，被军管会关起来后，身心压力都很大。他是个孝子，家有多病的老母。军管会抓住他急于想回家的心理拿他开刀，对他进行逼供。开始几天，张君尚能顶得住，拒不承认“5·16”问题。随着逼供的加剧和压力的增大，他顶不住了，终于痛哭流涕地向军管会承认自己参加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他幻想着承认了就能放他回家。

军管会很高兴，因为除我和尹聚平等外来户外，张君是738厂内抓出的第一个“5·16”分子。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个就不愁第二个，第三个……打过仗的军管会负责人知道突破口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张君可能是一条大鱼。他是管人事组织工作的，他既是“5·16”分子，一定发展了不少人。738厂的“5·16”之鱼一定少不了。于是，军管会负责人在全厂大会上洋洋得意地说：“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738厂这座庙不小，水也很多很深，‘5·16’这些王八、游鱼少不了。林副统帅要求我们‘一个不漏’，我们的办法就是‘网大眼小’。‘5·16’分子这次一个也跑不了。不把738厂的‘5·16’分子抓干净，我们决不收兵。我们还是那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张君既然开了口，下面的事就由不得他了。这正如长江、黄河大堤一样，只要开了一个小口子，就很难堵上了。

“要想早点回家，就要竹筒倒豆子。说吧，是谁发展你参加‘5·16’反革命集团的？”军管会的人边问边记录。

“67年我去北航串连时，认识了戴维堤，是他发展我参加‘5·16’的。他让我在工厂里发展‘5·16’成员，并交代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张君此时的嘴吧已经象决口的黄河大堤。

军管会的人又惊又喜，立即紧追不舍。

“你发展谁参加了‘5·16’？”

“我是管人事组织工作的，认识的人多，发展的人也多，让我好好想一想。不过，你们要替我保密。”

“这点你放心，我们会替你保密的。你一边想，一边写出来，记错了也不要紧，但不要漏掉，一个都不要漏掉。我们不搞蒋介石那一套，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我们是一个不杀，但一个也不放过。你老实交代吧！交代的好，可以从宽处理。”

于是，张君把厂里300多个干部、工人的名字写了出来，其中包括文革初期挨过批斗的原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等一批老干部都成了“5·16”分子。

于是，一批批干部、工人被谈话、审查。不承认怎么办？很好办，关押，逼供。“发展你的人都交代了，被你发展的人也交代了，你还等什么？”这是军管会的诱供秘诀。

于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许多人便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对于某些交代问题不太痛快象挤牙膏一样的人，军管会便让某些工人看守们练练拳脚，并长期关着不放。

一年多后我被放出来见到张君时，他的心脏病已很厉害。他含着泪向我说明了一切，并表示对不起我。他说他当时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甚至不想活了，天天思念老母亲和妻女，以泪洗面，心脏病常犯，差点死在“学习班”里。我谅解老张，劝他不要难过，好好养病。我调侃说：“老张你真有两下子。你这叫曲线救国，故意引导军管会犯错误。承认‘5·16’的人越多越好，法不治众。你事实上帮了大家的忙，军管会搞了扩大化，才草草收了场，否则把我们

整得还厉害。你干得漂亮。”

漂亮归漂亮，张君此后却高兴不起来。他是老实人，心胸不宽，总感到有愧于人，内心十分痛苦。他的心脏病越来越厉害，不久，他就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死时刚40多岁。我至今十分怀念张君，我敢说，如果没有抓‘5·16’运动，如果没有军管会的法西斯逼供、迫害，张君不至于死得这样早。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